

经典诠释的意义

景海峰*

摘要 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经典诠释的意义。第一，经典文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具有可延续的身份，它是一个流传物，具有活的特性，一般要经过漫长积累的过程；第二，经典文本具有扩张性、扩展性，意味着经典文本具有全新诠释的空间；第三，经典诠释具有恒常性和时代性。恒常性是指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原则。时代性是指在对经典进行阅读时，可以解读出新的意义，不同的时代，可以有新的理解。

关键词 经典 诠释 意义

一 经典诠释的流传性

对于经典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在今天阅读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来认定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文献。在今天，经典之名可能会有一些歧义，传统社会跟古典形态下的经典，比如儒家经学的形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先要对经典的特点做一些界定。

实际上，经典具有可延续的身份，它是一个流传物，具有活的特性。不管是在哪一个文明形态里面，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文献，或者是以书写的形式、以文本的形态存留下来的。但是，在这样的文献当中，很明显，它有一种流传的特点。比如说，有一种文本，在历史上的年头很古老，后来却失传

* 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与中国哲学。



了；或者是今天发掘出一个过去没有记载的、非常陌生的文本，那么这样的文本形式，就很难流传。

所以，古老性意义对经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身份。但是，并不意味着古老就是经典。如果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实际的影响，没有产生过相应的效能，那么这种文本可能就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讲的经典。它必须有传承的意义，代代相传，源源不竭，在每个时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或者它的思想是代代流传的，对某个时段或者一个长的历史时段发生过相当的影响。因此，流行或者是流传物这样一个特征，是经典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这样的特点，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活性。就像今天，各种观念或者思想都很活跃，每年的出版物、图书非常多。有些在一时间容易流行，但是这些读物它是不是就一定是我们讲的经典？那恐怕还要有一个历史的流传，这样一个检验。就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来讲，或者是儒释道的经典来讲，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源远流长、不断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在上古时代，当时的文献或者典策，和今天讲的书写或者作品有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它是对各种生活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是对自然和人生理解的归纳，这种文本具有漫长的积累和形成过程，跟今天讲的写作和创作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儒家讲的《四书五经》，如果按照今天的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积累的产物，一般把它放在春秋战国的背景下来理解，但它实际上可能是远古文明时期的产物，可以说是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最早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变成今天一直传演的文本。经过了漫长积累的过程，这是它非常重要的特点。

当然，这些文本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它经过了经典化的阐释之后，才有了某种比较重要的意义或者价值。这些确定性，也是经过慢慢的传衍才稳固下来。这种稳固下来，是靠不同的时代、靠后续的人们不断地去对它进行解释。试想这些古代经典，如果没有了解释的程序，那么这些文本，它的权威或者思想的典范意义，就不像今天所想象的那么的高大或者重要了。它是一个不断叙述、不断塑造的结果。经过几千年之后，这些文本就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到了汉代，儒家系统就有了比较确定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确定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恒常性或者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原则，就是以“常道”来解经。像班固的《白虎通义》说“有五常之道”，强调它普遍性的身份。这可能跟当时书写这些文本的日常经验积累或者所表达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不同，它有了一些不可动摇的意味在里面，强调所谓的“恒常”。这是最早对

“经”的把握。

通过这种“恒常”，来继续体会或把握它里面的原则，一些超越日常经验的或者具体性的原则。但是，这些东西还需要一代一代不断地解释、不断有新的理解。比如说两汉经学的新态，和《五经》里面的很多原理，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两汉大一统的要求，它和春秋战国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很多价值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汉人在集结这样一个系统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怎么赋予它一些新的意义。

两汉经学，包括对文本的选择、对段落的编排、对结构的调整、对某些问题的突出、对有些东西不太在意或者有意遮蔽，实际上就是时代性的一种重新的诠释或者根据时代的新问题来做解释的活动。它不是简单把先秦的文本承继下来，实际上有一个诠释的过程。因此，汉代经学已经形成了最早的怎么去解经、面对经典的基本方式和原则。

又比如说，中古佛教传入汉代之后，面对着印度的强大冲击，这种新的东西你要去回答它、应对它，它的价值对原有的文明典范有很大挑战，这就需要新的解释或者有思想元素吸纳来重新处理、消化原有的文本。它有一个融化的过程，就是把外来的东西进行吸收和消化。所谓的“新”，就是在诠释原有经典的基础之上，形成一些新的东西。对经典的承继方式，是通过一个重新的解释，包括对文本结构的重新调整、格局上的变化等等。比如说，汉唐经学是以《五经》作为中心，到了北宋之后，特别重视《四书》，《四书》显然跟《五经》是不一样的，《五经》是轴心时代的作品。

宋代特别重视的《四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传记。像《中庸》《易传》，在北宋五子的系统和他们的思想创作里面，扮演着核心的地位。所以，经典文本实际上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不断地有新的解释。它是流变的，活的，在不断增添新意义的基础之上，才构成现在看到的经典。

不管是对儒家思想的弘扬还是对经学做时代的诠释，实际上就是要跟今天的时代结合，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跟宋元明清或者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怎样从这些经典里面再吸收思想养分，面对问题来重新做一些解释，或者是给予再解释，把这些思想转活，这就是面对经典的一种基本态度。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强调经典的流变性或者它活的意义，它是在历史意义的叠加之上，在不断的诠释过程中才形成的，今天把这些文本看的非同一般，把它视为思想源泉，它的意义和价值依据就在于此。



二 经典诠释的扩展性

第二个问题，作为经典文本，存在着扩展性或者扩张性，或者是中间典范意义的转移。

在历史上，经典是在比较封闭的文化系统里面，它要成为一种具有生命性文本的条件是非常严苛的，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才能成为具有经典的身份。世界上有很多文明形态，尤其是宗教文明形态，这些文本可能带有超越意味，它和非人类、非日常的经验连在一起，属于神祇或者天祇的东西，具有超越性意义或者价值，才能够成为所谓的“经”。

在现在社会文化形态之下，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从于文本的意识和思想，已经大为改变。在这种状况之下，对于经典文本，一般不会有类似古典文化氛围中的那种心态，有一点点凡俗化、世俗化的味道。经典不是那么严苛，不是那么庄重，稍微具有凝聚性价值的东西，都以经典视之。现在是比较宽泛的理解，一般讲的经典，跟所谓的名著混在一起了。讲经典的解释或者是诠释意义的时候，先要在现代文化氛围当中和传统意义的经典做一个区别。尤其是在今天结构主义盛行的后现代氛围之下，经典很难有权威的树立。

在目前语境之下，很难有一种对经典定义的普遍的或者共识性的东西。在某学科或者某领域里面，大家在讲到经典的时候，都有一个默契。比如说儒家思想，那肯定就是《十三经》《四书》《五经》，以经典之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今天社会的普遍状况之下来讨论所谓经典，肯定先要做一些区分。

在《墨子·经说》里面有分名之法，或者是定名之法。定名之法，《墨经》里面讲“达、类、私”，就是达名、类名、私名三种，类似今天讲的范畴概念，类概念和单独概念。

今天讲的经典，按照达名之意，差不多古今中外具有典范意义的，比较有影响的，有一定流行性的著作，都以经典之名来视之，它没有任何区分，也没有古今之别。尤其是在今天的阅读活动里面，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

所谓类名，就是把范围缩小一些。类名的经典就是人文社科基础性的历史名著，类似文化发展的重要结晶和理论源泉。像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的

典籍，还有近代西方的哲人著作，像儒释道三家的基本典籍，就属于这个类别。

从私名的意义来讲，从文明形态，或者远古文化的起源意义来讲，就是对文化的走向起着决定性意义的典籍，才能以“经典”称之。比如说，世界各大宗教的圣典，像《圣经》《古兰经》；对中华文明来讲，就是《十三经》，或者说《五经》《六经》，这些著作对一个文明的根源意义特别突出。这是从达、类、私的分类来讲。

在今天的语境下，大家在谈论儒家经典的时候，理解也是有差别的。许多我们今天以经典视之的著作，可能不是儒家的，但是不能说它不是经典。因为在经过凡俗化和区分化之后的对经典的认知，不能仅仅局限在儒家书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经典。一般也把《四书五经》和佛教、道教的经典，包括诸子书，包括异闻类的，或者属于杂学的书籍放在一起。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也不限于《十三经》。讲到儒家经典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按照所谓达、类、私三类做划分。如果说，《五经》《六经》《四书五经》《十三经》是特定的含义，是私名之儒经。如果从类名的意义来讲，历代先贤的著作，比如宋明儒学大师的著作，包括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注释的解释性作品，比如像《四库全书》子部里面除了《十三经》之外的儒家。还有一些重要的注解作品，都可以放在类名的类节里面。达名就更广泛了，像古今中外对儒家思想有所发挥，对儒学内容有所拓展的重要著作，都可以被称为儒家经典。比如，现代新儒家的作品。这些现代作品，包括一些研究性著作，跟儒家思想有关的，都可以把它放在儒家系列里面来理解。

正是基于对经典理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要先做概念上的清理，再从义理上收摄，这样才能归拢到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上。研究儒学或者经学，就这样一个更具体的范围而言，这里面所讲的经典，显然跟世俗所谓的名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强调的文化典范意义和长时段的历史影响及往往要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或者反映“常道”的典籍才能称之为“经典”。这些书，对于人格塑造、社会制度，各种意义的解释，对哲学意义的阐明，是其他典籍无法替代的。在历史上，只有所谓《六经》，只有这些根本之典才能以“经”称之。到了汉代，儒学独尊，儒家经典的面貌逐渐变得清晰，得到了一种常规性的塑造，确立了它的思想权威，成为后人去沿袭和解释的对象，这样就形成“经学”。



经学的形态形成以后，它的系统也在逐渐变化，最早是《六经》。《六经》之名从《庄子·天运》开始，到汉代的博士设立，这个系统具有固定性。但是从汉以后，这个系统也在变化，包括文本的变化。比如说，最早的解释这些“经”的作品，就是传，或者记，这些作品后来慢慢地也获得了“经”的身份，就是“以传入经”，文本的阵容由此扩大。从后汉开始一直到宋代《十三经》的形成，中间的变化、文本的调整是非常复杂的，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还有不同时代的变化。这里面，一方面是它内部的调整，就是从三代文明的遗迹，逐渐转移到《四书》之上，其思想源泉就有些差别。在经学内部就产生了后来的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在先秦时代，跟儒家的这些书具有同等身份和地位的文本，后来已经不称之为“经”。因为儒家“定于一尊”之后，佛道之书和诸子书，都被排斥，可能它最早之时具有经典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在四部类别里面就被放在子部里面，和“经”的身份拉开了距离。西晋之后的“四部分法”，实际上就是一个排他或者是排除的分发。经典系统只有儒家，而且是儒家里面最根本的典籍才能以“经”称之。中国古代的文化或者思想，像《史记》这样的著作，是中国古代典籍里面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在“四部”的划分里边，它只是儒术。另外，很多诸子著作，都和“经”的概念暂时地拉开了距离。“经”就成了儒家独占的东西，佛道之书、诸子之书都不能以“经”称之，都在子部里面，这和前面所讲的经典的现代理解，差别是非常大的。

现代经典的意义，相对于古典的形态或者四部里面“经”的意义，它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传统经典是从文明源头的意义来确立它的身份，是一个古老的、久远的原典。今天讲经典也经常是这样理解。在现代的视野之下显然这个看法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讲的经典，可能是从所谓的文化形态的典范或者是形式的典范意义来着眼。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经典实际上也有一个转移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形态里面，经典的价值和身份也会发生变化。在某个时段里面它比较重要，甚至比较显赫，在那个历史时期，在那样一个文明视野之下，这种普遍价值可能凝聚的比较多，它的意义就最重要，因此被视为是经典。但是随着历史的变化，随着文化的移动或者挪位，这种典范性可能就消失了，可能就被后来新增长的因素颠覆和取代。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来重塑经典，或者重新来做一个经典的构造。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是常态。当然，有的经典系统具有稳固性或者是长久性，但是这种不断重复或者调整的过程，是一直持续的。所谓的重塑，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彻底地把它去掉，可能是旧瓶装新酒。在旧瓶装新酒里面，它可能是一种重新解释，要赋予它很多新的内涵，原来的框架，形式还保留着。但内在的跳跃、意义的转换是很大的，有时候理念也会发生变化，甚至是有意曲解。在典范转移里面，这是常见的现象。有时候原有的形式是解无可解了，到了尽头了，这时候就要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所谓的另起炉灶。在这个方面，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绘画形态跟西方是有差别的，在西方文化里面，它革命性的变革会多一些，它有明显的断裂性，尤其在近代，每一个大哲新系统的出场，都是从头来过，把前人的东西给批判掉或者颠覆掉。

我们看中国传统，所谓的解经，或者是诠释的方式，它就比较重要，使得文本的存续有一个连续感，所以不管是儒释道还是儒家的经学系统，差不多都是围绕着《四书》《五经》进行讨论的，跟西方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别。新时代，对儒学的复兴，还是要回到原典，从对《四书》《五经》的诠解入手。西方宗教的文化形态也有比较恒久的，比如说《圣经》的研究，在现代文化的世俗形态里面也是自成一格，有独立保持的形态。

当然，跟宗教的文化形态相比，与一般世俗性和日常生活紧密联在一起的文化形态，它的转换速度就要快一些，而宗教的封闭性，则比较复杂，这是从中西大的断裂和联系的不同形态的意义来解释。在西方，它也不是全都另起炉灶，也有比较稳固的东西。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里面讲范式，讲近代科学背景下的知识结构的形态变化，它从科学发展中的转折点，比如说哥白尼、牛顿、拉瓦锡怎么创构新的范式，然后他提出了“科学革命”的概念。

如果将经典的典范意义或者是库恩的分析放在一起，实际上有一个类似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怎么样从过去的、传统的诠释中有一个转折，有一个新的起步，建立另外的系统。实际上，它有一个思想的变迁，包含了每个时代的鲜活观念和价值变化，要不断地去重新理解。这实际上是从一种活动的、流变的意义来理解建构的意义。建构不是说把它僵死化了，就成了一个没有活力的形式。

从扩展性来讲，经典的原意，或者说原有文本形式，它所涵具的内容可能是很有限的。尤其是记述日常经验的、具体场景的文字，实际上很有限。



本来是日常的、很具体的表达，最后变成带有高度普遍性意义的文字，这实际上是不断叠加的效应，好像经典成了灵丹妙药。

当然，经典是带有普遍性内容的，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抽象的原则，实际上它是在具体的历史场景里面的理解，跟历史的情景、跟事物的具体性是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的状态之下，肯定是有它的局限性。怎么把这些意义和价值扩大发挥，或者是阐发，实际是后续不断解释的问题。

但是，这个解释不是完全另起炉灶，不是重新开始，这样对文本的内涵有意义的翻转或者是新意义的凸显。有时候文本所讲的事情范围是有限的，它要借经典的权威，所以要寄生到这个序列里面，然后在它里面补充新的东西进去，这就是“经”的扩容过程，即“以传入经”。文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怎么样才能获得“经”的示范性，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把它从另外的身份变成“经”的身份，而是通过解释的途径和渠道，把这种新的意义添加进去。在经学发展历史上，或者中国古代思想的传衍过程中，这些问题就非常复杂。这是第二个问题，从典范的问题或者是经典意义的扩展谈起。

三 经典诠释的恒常性和时代性

经典在一个文化脉络或者文化系统里面，它是要发挥一种独特的功能和效用，才能够获得它的一种普遍性，获得它中心的位置，即所谓的核心价值，这是一个基本的意义。另外，它可能带有一个可诠释的空间。在文本的理解里面，可以解读出新的意义，不同的时代，可以有各种各样新的理解。像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四书五经都居于核心的位置，成了整个儒学系统思想演进活的源泉，所以才有经学。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去解释这些文本，发挥这些文本里面的思想，使得儒家成为中国文化里面一个不断更新的系统。

现代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唐代以后，科举考试在制度上给儒家经典确定了唯一性、权威性，但是废除科举之后，这些经典就不是每个人必读的东西，已经没有这种地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思想的地位同历史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作为经典解释主要形式的经学，逐渐成了历史的沉积，跟现代文化分道扬镳了。

传统的解经方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学术形态。在现代学术体系里面，旧经学可以说是非常边缘的，当然有很多人在做经学，但这个经学已经不是历史上的经学形态，它已经是在新时代形态之下的一个学术研究，已经是很边缘的古典学了。这跟历史上的情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经变形、走样了，包括经典的经学史研究的很多方式，它只是过去经学的一个现代的变形、走样的状态。

尽管这些经典还完整地保存着，但是这些文本的意义，显然跟历史上不一样了。在今天的儒学研究里面，这些经典大多是一个材料的身份，而且是被各学科分门别类使用，有从语言文字做的，有做历史材料的，有做文献考古的、考据的，有从社会制度等等，非常复杂，每个人在面对这些文本时采用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举个例子，如何解读儒家经典，研究哲学和历史的肯定不一样。从社会制度分析、做语言文字的研究，手里运用的都是这个本子，但是处理方式是差别很大的。基本上是分科而治，不同的学科来处理这些文本。它和传统的经学或者是历史上儒学经典的统一背景，已经有天壤之别。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理解经典，怎么样解释经典，怎么样来解读经典的意义？实际上，分科而治带来了不同的学术领域，在不同的研究方式之下来呈现。比如说，比较重义理的、哲思的，作为性理的东西，可能跟考据的、训诂的就有些差别，所以有汉宋之别、汉宋之争，思想和工具本身就会有一些背离。

在现代分科背景下，体制化的学科形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况。比如做语言学的，跟做哲学研究的、做儒学研究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今天的格局之下，我们处理史料的时候才比较重视“小学”的工夫，就是从训诂到文献研究。你要阐释它的思想，尤其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下，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西方的东西，就是西学的东西。怎么样回到经典本身来重构儒学研究的系统，这是目前所碰到的一个大的问题。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之下，把经典的意义价值转活，成为生机勃勃、具有创发性的资源，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

儒家经典孕育的普遍价值和意义，跟时代的具体性，它有很多需要去重新理解和解释的东西。我们今天探讨经典的意义或者经典诠释的问题，主要目的是在这个地方。作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存续的所本文献，或者经学丰厚的资源，在经受西学的刺激和考验以后，怎么样从原来的只是做材料的整理



或者是文献意义的工夫转化成今天思想创造的需求，怎么去结合，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时代性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讲经典或者是研究儒学、研究经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纬度。如果说只是从文献的意义去理解，那么它跟我们目前所要达到的要求，我们今天对儒家思想的期待，可能就有很大的距离。

(责任编辑 张兴)



Re-understanding of Some Basic Ideas of Confucianism

Dong Ping

Abstracts: First , through learning and promotion to summarize the Confucian may be more reliable than a learning both sou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 the so-called collectivism often manifests itself through individual self-awareness. Third ,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From Confucius , Confucianism expressed an effort to surpass the restrictions of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For the breakthroughs in individual ego , breakthroughs in blood relatives ethics and breakthroughs in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go the road trip , the whole world as one community. Fourth , Confucianism use the love of equal difference as the basic arithmetic or as the mean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lead people to fraternity. Fifth , ritual is higher than the rule of law. It both includes the rule of law and higher than it.

Keywords: A Learning both Sou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dividu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Love of Equal Difference; Ritual

The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Jing Haifeng

Abstracts: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 the classical text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it have the identity of continuity. As a circulating material , the classical texts have vivid characteristics , which usually take a long time to accumulate. Second , the classical texts are extensible , which means that it has new space to interpret. Third ,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onstancy and times. Constancy means it has a general princip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means to interpret new meanings when we read classical texts. There is a new understanding in different times.

Keywords: Circulation; Extensibility; Constancy; Times